

寄名与跳墙

平凡

在中国古代，一个小儿出生以后，一般要举行一系列的诞生仪式，以庆祝孩子降生人间，表达家人的喜悦之情。但是忧虑随之而来，因为中国古代医疗水平普遍低下，婴儿的成活率并不是很高，在小儿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疾病灾难，尤其是天生娇贵、八字太硬或体弱多病的孩子，能否顺利长大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于是人们想尽各种方法以驱灾除难，保证小儿顺利长大，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小儿成长仪式与习俗，这些习俗多与佛、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求助于神明，让神灵直接庇护儿童，这是一个通行的办法，而仰赖神佛保佑的最简便、最牢靠的途径，又莫过于直接让婴儿皈依佛道，而成为神佛的弟子，那么恶鬼就不敢来侵扰，小孩就可消灾得福，顺利长大了。但是父母又舍不得真的让孩子出家当道士或和尚，于是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即做寄名道士或和尚——让孩子在寺观里挂个弟子的名义，实际哺养仍在家里。寄名的孩子不用真的到寺观里去修行和过宗教生活，只是在一些重大的宗教节日或法事活动时去庙里进进香就可以了。

寄名寺观的习俗在中国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有钱人家寄名的仪式是很隆重的，《金瓶梅》第三十九回对此有很详细的描写：西门庆之子宫哥儿生下后身体娇弱，于是到玉皇庙住

持吴道官处寄名，寄名那天设坛建醮，诵经礼忏，关发文书，将官儿的生日八字，另具一字文书，奏名于三宝面前，起名叫做吴应元。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寿龄永保，富贵遐昌。”通过一系列的仪式在神前奏请寄名之后，吴道官送给官儿一些道服和法物：一顶黑青段子绡金道髻，一件玄色绉丝道衣，一件绿云段小衬衣，一双白绫小袜，一双青潞绸纳脸小履鞋，一根黄绒线绦，一道三宝位下的黄线索，一道子孙娘娘面前紫线索，一付银项圈条脱，刻着“金玉满堂，长命富贵”，一道朱书辟非黄绫符，上书着“太乙司命，桃延合康”八字，就扎在黄线索上”。这样，官哥儿就成为吴道官的寄名弟子、玉皇庙的寄名道士。那些线索、项圈、符篆之类的法物是要时时挂在项间的，表示自己是寄名道士，

受到神仙的佑护，鬼物们赶紧退避吧。

《红楼梦》里讲到贾宝玉经常戴着长命锁、寄名符，他寄名的干娘是马道婆；凤姐的女儿也戴着张道士给的寄名符。可见明清以来儿童在道观寄名之风是很流行的。

富贵人家如此，普通人家也流行寄名之风。《中华全国风俗志》下“天津小儿跳墙之风俗”里讲到天津小儿寄名的风习：“天津北仓镇每年当春夏之时有小儿跳墙之俗，此风俗之起因：大凡缺少子嗣之人家，忽然生下一个男孩，自然爱如珍宝，但是一方面却时时惶恐，或是多病或是夭殇，因此为父母者往往带小儿到庙

中祷香祷告,求和尚给小儿起一名,俗称寄僧名,其意谓自此以后,此孩便算出家。寄僧名之孩,往往作僧人装束,直至十二岁跳墙还俗之时,方能更换。”寄名之后,虽然不算正式出家,但还是要经常穿着僧道的装束,直到十二岁跳墙还俗为止。

小儿寄名庙中主持道士或和尚,法名随道士姓,如上述西门庆之子法名吴应元,是随吴道官之姓,此种称之为寄名道士或寄名和尚。还有一种寄名神佛的方式,即直接将小孩寄名于某某神,表示此孩已是神的子孙,自然百鬼不敢侵犯了。如旧时绍兴民间,怕小孩养不大,往往在神佛处“寄名”;而寄名最多的寺观是香火兴盛的关帝庙和包公殿,绍兴人特别崇拜关公和包公,称之为关爷爷和包爷爷,有的还在爷爷后加称“菩萨”,因此小孩寄名也以这两位神明居多。凡寄名于“关爷爷”的,在名字是中冠以“关”字,如关根、关仁、关兴等;凡寄名于“包爷爷”的,亦则冠以“包”字,如包昌、包良、包法等。但这些孩子一般不改姓氏。如王家孩子寄名“关爷爷菩萨”而得名“关根”,他的名字就为“王关根”了。寄名以后,寄名的孩子仿佛成了“关”、“包”两位的族人,从而能够获得终身的平安,家长亦可藉此得到内心的宽慰。向菩萨“寄名”这天,由道士或和尚带领小孩到关帝庙或包公殿,在寄于名的菩萨面前点上香烛,然后进行跪拜祈祷许愿。以后凡每逢寄于名的这尊菩萨生日,都应去向他敬香烛,以示谢恩。

在浙江、江苏等地,这种寄名神佛之风是很普遍的,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又载吴县之奇俗:“吴县有小儿寄名神佛之俗,此风全境皆然,盖富贵人家之小孩娇生惯养,大半身体柔弱,时得疾病,其亲乃至庙烧香,用红布制一袋置小儿年庚于其中,俗名过寄袋,悬佛榻上,自是以后,每旧历年终寺僧备饭菜,送小儿家中,名曰年夜饭,其亲必给僧以钱,奉送三年始毕,当过寄时僧为小儿取名,譬如神佛姓金即取金生、金寿等类,并携小儿来庙拈香,呼神如寄

爷,及至成年完婚后,乃将红布取回,名曰拔袋。”

在绍兴,作为家里的长子,鲁迅一出生就举行了种种仪式以保证他长大,除了通行的“满月”和“得周”的各自的祭祀以外,还要向神佛去“记名”。“鲁迅首先是向大统蠡(地名,本来是一个大湖)的女神记名”。据周作人回忆,这个女神可能是道教的重要神祇九天玄女(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师父与先生》)。

在广东民间,人们信奉王母娘娘为保护生育与儿童之神,亦有寄名娘娘与六位夫人的习俗,所谓“人民生子女者,多契神以为父母。西王母与六夫人像,悉以红纸书契名贴其下,其神某,则取其上一字以为契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以西王母与六夫人的名讳中第一字作为契名,这与寄名关帝则以“关”为名字中的一字,其风俗是一样的。

做寄名道士也好,寄名于神仙也罢,其目的都是借助神的法力驱逐小儿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妖魔鬼怪,保证孩子顺利长大成人。在小儿长至七、八岁或十一、二岁时,生命力增强,成活应该没有问题,这时就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进行“还俗”,脱离道籍,脱离神的世界,而进入到世俗社会中来。这种仪式称为跳墙。

跳墙是和寄名联系在一起的,先当上了寄名道士,然后才有跳墙还俗。前引《中华全国风俗志》讲天津小儿跳墙事很详细,小儿寄名以后,到十二岁始还俗,举行跳墙仪式:“跳墙事前,必须择选一吉日,买簸箕一只,毛帚一把,预备老铜钱八枚。及期,为父母者带领小儿,又向神像焚香祷祝,一面使小儿持簸箕及毛帚,拂拭香案,洒扫地下。事毕,即令理发匠为小儿留发,随后再使小儿立于板凳之上,左右手各持老钱四枚。旁观之人,喊声‘赶和尚’,小儿便将手中所持之钱向后撒去跳下板凳,并不回头,直跑至家中。此即所谓跳墙还俗也。当小儿撒钱之时,旁观之人,纷纷拾钱,带回自己家中,编成锁之形式,给自己小孩带在身上。照俗谚云:‘带了此锁可以长命。’”

所谓跳墙,就是以板凳代表庙墙,住持师父在小儿头上象征性地轻打几下后,小儿跳过板凳,头也不回地逃出庙外,跑回家中,表示已经被驱逐出庙,跳墙还俗了。常人春先生曾写过一篇《关于跳墙和尚》,讲述三四十年代老北京的风俗,对于和尚或道士跳墙的仪式描绘得非常详细:

至于什么时候“跳墙”,并无具体规定。但凡记名和尚都必须在结婚前三天举行“跳墙”仪式,表示还俗。

按旧例,小孩“跳墙”那天,家里要舍给庙里一头驴,或者请冥衣铺给糊一头纸驴,表示代替小孩今后给庙里出力,侍奉“三宝”,即佛、法、僧。还要做一套僧装,包括僧帽、僧鞋、僧袜,但并不给小孩穿上,而是摆在殿上,表示刚脱下来的。此外,还须买五十双筷子(共一百根)、新扫帚、新簸箕、新掸子各一把,摆在殿上备用。殿前,设一条板凳,上面搭着五尺红布,表示是寺庙的红墙。

仪式在僧众们用斋后开始。首先由家长带领小孩上殿设供焚香,给佛、师爷爷、师大爷、师父和师叔等依次叩首礼拜,师父即将原来所挂之“锁”上的三枚小铜(银)币用剪刀拆下,让小孩用新买来的扫帚、簸箕假装儿的打扫一下殿堂,无非是将供桌前地下的高香包装纸和香灰扫扫。然后,由两人扭起一块红布,让小孩披上新做的僧袍,站在底下,面朝殿外。这时,师父便走过来,说道:“自小多灾害,父母担惊骇。自许入空门,全凭佛爷带。前殿不打扫,后殿不礼拜。脱下僧袍来,赶出山门外……”说着即将一百根筷子一齐撒手,落在小孩头顶的红布上,意为打了一百禅杖。简单的则不用红布,只是师父用戒尺一比划,就算打了。这时,小孩要马上将僧袍甩掉,跳过殿前代表庙墙的板凳,跑出一百步,不要回头。随后,僧众和居士们即齐声唸诵《消灾解难经》,即《吉祥咒》。最后,由值堂和尚将香根请下来,有纸驴者当一并焚化,遂告礼成。

可见,北京、天津两地跳墙的风俗与仪式

是大致相同的。跳墙仪式常常是在寺观举行庙会时举行,如在娘娘庙会、关帝庙会、药王庙会等等庙会上,常能看到小儿跳墙之热闹的场面。如清光绪《吉林通志·岁时民俗》载:“四月十八日,东关娘娘庙会,妇女焚香还愿,有献神袍、幔帐、金银斗、替身人等物。小儿七八岁每于此日留发,囑儿立凳上,僧人以箸击顶,喝令急行,不许回顾,曰跳墙。”

这种风俗在我国北方地区很盛行,常常是小儿自幼多病,于是寄名为道士或和尚,而寄名的寺观常常是民众普遍信仰能保佑儿童的娘娘庙或是包治百病的药王庙等等,跳墙之事自然也在这些寺观举行。各地方志对这类风俗多有记载,不再赘述。

跳墙的习俗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曾流行,反映了中国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对于神灵的依赖,也反映了道教、佛教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生礼俗的渗透。小儿举行跳墙之仪式一般在七、八岁左右,或者在十二岁左右,或者在结婚之前,北方一般称之为跳墙,而南方则有称之为“脱白”的。如民国十年《合川县志》有“寄名、脱白”条:

因小儿多疾,则于寺观中请僧道取一法名,谓之“寄名”。凡寄名小儿至十二岁时始蓄发。届期家属具香烛、白鸡、白犬,携小儿至某庙换去出家衣服,逐出山门,谓之“脱白”。

跳墙也罢,脱白也罢,都是寄名于道僧的小儿在长大还俗时举行的仪式,它所代表的象征意义都是相同的,即表示被师父驱逐出庙,从此脱离道籍还俗,开始新的生活。此外,寄名于神佛的小儿,是在成年完婚时结束这寄名的关系,举行的仪式称为“拔袋”,因为当年寄名时曾将装有小儿年庚的红布袋寄存在佛橱中,现在要将红布袋取回,故称为拔袋。而广东寄名于西王母和六夫人的小儿在成年结婚时,是请巫师举行一定的仪式,将得之于神的契名除去,表示结束了与神的寄父母关系。